

李元瑾序

南洋大学：走在摇晃的政治钢索上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以下交替使用）的历史，不可能是一部单纯的高等学府历史。它从倡议、创办、发展直到原貌消失，似乎没有一刻可以摆脱与政治的纠葛。研究南洋大学历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政治都是无法被漠视的元素，否则个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将无法理清。此处所指的政治，也不是单纯来自南洋大学的所在地，其周遭国家/地区以及在当地角力的远方国家和政治阵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与南洋大学直接交锋的政治力量，则来自其所在地几经更替的政府。

南洋大学为何会与政治长期纠缠在一起？顺着上段的思路，我们从横纵两个切面作剖析，应该有助于对问题的了解。我们先打开一张横切面图，第一圈是南洋大学所在地——新加坡，第二圈是新加坡的所在区域——东南亚，第三圈是殖民地时代深刻影响新马两地的中国与英国，第四圈是二战后冲击东南亚的世界两大冷战阵营。紧接着，我们打开另一张纵切面图，那是新加坡政治的发展脉络，可划分为殖民地、走向自治、走向新马合分、新加坡独立建国等不同时期。

将这横纵两个切面图放在一起互相参照，我们看到，南洋大学诞生于第四个圈子的世界冷战初期，适逢新加坡努力摆脱殖民地统治、走向自治的时候，因而面对着岛内外大变动的撞击。我们也发觉，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在不同政府时期的发展，都受到第一至第三个圈子的制约，这里指的是新加坡的先天性结构与历史遗留，包括地理位置、族群结构、中英两国的较劲、中英两语群的对立、英

文的强势、华校的办学传统等。至于在第四圈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反共氛围，南洋大学更是直接受到影响。于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许多有利和不利南大的因素，相继出现。

从新马两地大部分华人移民的角度来看：在殖民地时代，认同中国、维护母族传统、发展华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二战后虽然本土认同大为提高，国家意识也逐步形成，但是保留传统文化、提升华文教育也是需要的、责无旁贷的，不仅有助于“我群”的提升，而且有利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南洋大学就在二战后东南亚与中国疏离的情况下诞生，创办人继承了过去的办学精神，也延续了以往的办学方式。

从新加坡政府的角度来看：站在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如何利用华人勤奋的优点为我所用、如何在中国元素的积极干扰下维持对华人社会的控制权和新加坡的英语优势、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操弄族群政策以巩固政权、如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以维护权益等，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对于二战后经历自治、新马合分、独立建国的各个时期的政府而言，如何团结各方力量以驱走殖民地势力、如何淡化华人的中国意识和华族色彩以加强地方的效忠意识和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如何维持英文优势以巩固政权及沟通各个族群、如何控制华文教育的发展但又不激怒新马华族群体以换取政治资本等，也都是必须正视的政治命题。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作为华社聚焦的场域，遂成为各时期政府的烫手山芋，既是被消磨的对象，也是受操弄的工具。

作为中港台境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出现对所在地/区域的其他语群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而遭遇英语群和马来语群激烈的反弹。在新加坡，政治领导权一直落在英语群手中；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政治高位也先后由英语群和马来语群所占据。至于华语群（包括大部分讲方言者和受华文教育者），无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从自治至建国的不同时期，都没能掌控政权，唯

因人数众多，聚集经济能量，逢政治选举时又有角色可扮演，其权益才不至于完全被忽略。但该语群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其认同意识，包括地方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长期引起其他语群的疑虑。语言在这种情境下复杂化了，致使教育与种族和政治产生诸多纠葛。

因此，在新马的语境里，语言背后隐藏着各种矛盾，包括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矛盾、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华族社会内部不同语群之间的矛盾。而新加坡各时期的政府，除了自身涉入各种矛盾，也利用这种种矛盾，达成其政治目的。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卷进社会语群和族群的分歧中，旋即掉入政党纷争里，并在政治泥沼中越陷越深。例子显而易见，譬如，殖民地政府原本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不欢迎南洋大学的创办，但又碍于其支持者的浩大声势，于是利用其他语群的反对声音，进行“默反”，直到美国势力介入，才“默认”南洋大学的存在。又如，林有福掌政时期，为了1958年自治大选的需要，同意南洋大学成立学术评议会，讨论学位承认的问题。当他获悉《白里斯葛报告书》不赞同承认南大学位时，因为担心失去大批华人的选票，便藏起报告书不对外发表。而大选结束后，人民行动党获胜，则即刻公布该报告书，以此为工具，催促南洋大学改组。政治操弄教育的效果显著，以致陈六使也转而诉诸政治，鼓励南大毕业生参加1963年的大选，以寻求突破。但结果却落得个一子错，全盘皆落索。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对外处理了新马合分的纷扰、对内击败反对党稳定政权之后，即挑起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任。在国家建构的框架下，政府一步步地加强对南洋大学的控制权，让它按照执政者的目标、理念和计划进行改革，最后将其纳入国家的教育系统之中。1963年大选过后，陈六使公民权被褫夺、学生会被解散、校园内经历了一番“清洗”，南洋大学失去了与政府抗争的能力。

继政治化之后，南洋大学即踏入国家化的进程。1968年政府承认南大学位，象征着南大国家化的初步完成。这是一次华英两个语群的斗争，而且从教育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并在国家的大帽子下分出胜负。从此，南洋大学的走向，是一层层“华彩”的剥落，最后“水到渠成”，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纳入以英文为主流的国家教育系统之中。

南洋大学从倡办到消失，只经历了27年的短暂岁月，却始终无法与政治脱钩，而且与各时期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南洋大学历史，如果排除政治、避开政府，那什么都厘不清楚。然而，在新加坡的语境里，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类的课题，相当敏感，而且不易处理。因此，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2000年，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展开“南洋大学历史研究”计划而设立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周兆呈被录取了。他选择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1953-1968）”为博士论文题目，以期弥补南大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周兆呈面对几项挑战。首先，作为新移民，他需要加强对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了解。再者，作为新闻从业员，他需要适应学术研究与书写的要求。当然，作为非全职研究生，他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其实，他的最大挑战是，南洋大学至今还是个敏感课题，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更是如此。这意味着他在史料收集和论文撰写过程中有相当大的难度。

不过，事情总有两面性。周兆呈在中国成长和接受大学教育，于1998年移居新加坡。这样的背景，使他在研究南洋大学时没有历史包袱和情感负担。他不预设任何立场，尝试采取多元观点和宏观视角，让资料说话、对历史负责。他于199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印尼华人与中国印尼双边关系（1965-1997）”。换言之，他对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已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并受过学术训练。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周兆呈也充

分发挥其新闻工作者的优势，一方面进行南大口述历史访谈和个人访谈，与不同背景的受访者接触，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另一方面翻阅各时期新加坡中英文报章、南大出版物、政府文告、国会会议记录等文献资料，并以专业的敏锐眼光，去比较和判断当年文献的价值所在，为研究所用。然而，他毕竟受到史料的制约，在摸索了一段时日，发现难以寻获从1968年到1980年与主题相关的充足的第一手史料，因而决定宁缺毋滥，把研究下限设定在1968年，亦即南大学位受承认的那一年。他充分利用1953年至1968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包括英国档案馆保存的殖民部资料和新加坡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教育部档案，集中呈现与剖析这段时期复杂的南大历史图像。

经过五年多的辛苦，周兆呈终于完成论文，获颁博士学位。接下来的几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学术方面的活动、教学和研究。与此同时，他陆续修订博士论文。本书《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便是他修订后的成果。书名中，“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是研究的主题，“语言、政治与国家化”是论述的主线。作者通过主线呈现主题，而两者在各自纵横交错的框架下推进，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的纵横互动中发展。

本书将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分成五个时期，即殖民政府时期、劳工阵线政府时期，以及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三个时期，覆盖了殖民地、自治、新马合并与分家，以及独立建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作者通过比较研究，纵向考察两者关系发展中的种种延续性与差异性，横向探视两者在每个时期互相比较劲的因素和细节。本书从早期语言/族群造成的社会分歧到二战后政权/政党引发的政治斗争，展现了族群、教育与政治的纠葛；再到国家建构阶段，论析南洋大学失去“自由意志”，被迫按照政府的目标和设计发展，最后在国家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质和原貌。

本书条理明晰，且有多处精彩的论述。例如：作者强调，南洋大学与不同时期的政府存在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矛盾，但大学的控制权之争一直是两者关系的主轴，而这控制权又受到各种影响大学的性质、方向、行政、人事、思潮等因素的制约。又如：作者多处论证，南大学位的承认一直是南大与政府之间博弈的焦点，它是南大的目标，也是政府的工具。书中有关“南大国家化”的表述，更引人入胜。作者指出，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大学国家化是必然趋势，它按照强势政府的国家目标、国家特性、政治格局、政党体系等要求进行国家化。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么写：“南洋大学的演变成为一种隐喻，即折射出迁民社会如何在新加坡从早期的数量优势、政治弱势，到争取地位、维护利益，再到屈服强势主流、被迫淡化族群文化特征，乃至最终在国家化的作用下，完成了对国家及国家文化的效忠。”

这场“国家化”的演变，牵动着许许多多人的心弦。新加坡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华语群付出痛苦的代价，其过程与结局让一整代人的内心备受煎熬。周兆呈显然十分关注南大在“国家化”下的演变过程，但受制于史料，研究下限止于1968年。这之后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他只能作基本的叙述。读者在分享他对南洋大学“国家化”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的探究时，自然对其下一阶段的研究充满期待。周兆呈前方的路还很长，新加坡的政治氛围也在渐变之中。我希望他继续努力，挖掘更多珍贵的史料，将来完成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再出版一本学术佳作。